

【论 文】

冷战后欧美跨界族群的研究 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孙 雁¹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自然面临复杂的跨国族群问题。这即给跨界交流合作增加了机会，又给边疆稳定及和平共荣带来挑战。本文将综述冷战后欧美有关跨界族群研究，并它们对思考和处理中国相关问题的启示。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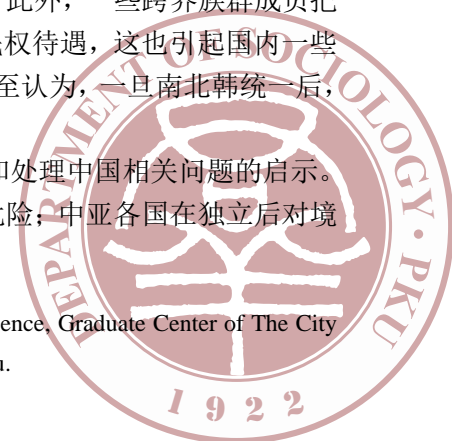
冷战结束后，全球诸多地区出现了族群冲突，国家解体，国民四分五散的现象。尤其在东欧和后苏联各国，新老国家的重组过程中遗留或产生了许多跨界民族。跨界民族这一似乎不属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题目，也随之成为该领域的瞩目议题。近年来欧美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界族群是否增加分裂主义或内战危险这一焦点上。同样受关注的还有跨界民族的亲属国（或称祖国）及东道国（即居住国，国籍国）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多重国籍引起的治外法权问题，跨界族群的国家认同等议题。

跨界民族指相邻两国里均有的族群，其格局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居住国为少数，在邻国为多数族群；比如越南泰国缅甸的华人，中国北方的蒙古族和朝鲜族，中国南方泰语系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亚各国的俄罗斯族。二是在跨界两国均为少数民族；如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族，中国和尼泊尔的藏族，中国和缅甸的掸族和景颇族。三是在跨界两国均为多数族群；如南北韩国，东西德国，曾经的南北越南。有的西方学者把中国大陆与台湾也归于这一类。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自然面临复杂的跨国民族与族群问题。这即给跨界交流合作增加机会，也给边疆稳定及和平共荣带来挑战。比如外蒙古对中国所谓“复国主义”的担心影响了中国在蒙古的投资；中国对南韩个别“领土收复主义”言论的戒心影响了南韩在延边的深入投资；中国对“三种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的忧虑影响了新疆主要族群与邻国进行经贸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机会，维吾尔族公民甚至很难申请出国护照；跨界族群在中缅边界的分裂战争影响到中国边境的安全和正常贸易活动。此外，一些跨界族群成员把孩子送到亲属国求学，有的退休后到亲属国兼职，有的享受部分公民权待遇，这也引起国内一些学者和官员对他们的认同感和对国家的“忠诚”产生怀疑。有学者甚至认为，一旦南北韩统一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必起分裂思潮以求统一。

本文将综述近年欧美有关跨界族群的研究，并点评它们对理解和处理中国相关问题的启示。这些研究结果对中国来说是乐观的：跨界民族并不增加分裂主义的危险；中亚各国在独立后对境

¹ 作者为美国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学系教授，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Graduate Center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365 Fifth Ave., New York, NY 10016, ysun3@gc.cuny.edu.



内少数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族）保持了节制和理智的政策，从而避免了进一步的分裂运动和内战；跨界民族的治外法权利弊参半；跨界民族的多元认同并不损害国家主权。总之，跨界民族对边疆发展和和平共荣利多弊少。

跨界民族是否增加分裂主义和内战的危险？

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的观点，将原因归咎于“动机”与“机会”这两大方面。

从动机上看，首先是“领土收复，国家统一”的民族主义情感。著名的民族学学者盖尔纳(Ernest Gellner)指出，“人民的意愿”在近代被广泛定义为国家主权与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因此被统治的少数民族通常对掌握国家机器的统治民族抱有不满意(1983: 1)。如果这个少数民族正好在跨界有掌握国家机器的亲属国，而后者同时也有民族统一的抱负，则会出现政治学家 Myron Weiner (1971)所说的“马其顿现象”：即跨界少数民族、亲属国、东道国这三方力量形成两股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相互刺激与相互对峙；而两国的政客们又借机以“分裂”与“反分裂”的名义要么煽风点火，要么采取干涉政策，造成边境两边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不少实证研究也证实，跨界族群对分裂运动的确有催动作用(Gleditsch 2007; Saidman and Ayres, 2000; Saidman 1997 and 2001; Cederman et al. 2009)。

第二种动机来自亲属国民众对跨界侨胞的同情。比如侨胞在邻国里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落后，而一旦他们发起了反抗运动，自然会得到亲属国同胞的支持(Woodwell, 2007; Mousseau 2001; Hegre et al. 2001; Sambanis 2001)。如果亲属国是民主国家，政客们会出于民意和选票的考虑对邻国采取干预政策，以赢得本国民众的支持(Saidman 1997; Holsti 1996)。即使在非民主国家，专制者也可能出于内政压力而支持跨界同胞反抗当地政府的运动(Partell and Palmer 1999; Woodwell 2007)。

第三种动机与亲属国的国内政治需要或对外政策的战略利益有关。比如跨界领土内资源丰富或地缘位置重要。有学者认为，亲属国不会轻易为了跨界同胞而与邻国交战，但出于国内政治或国际地缘政治的需要，则可能借此谋取更大的实际利益(King and Melvin 1999/ 2000)。

第四种动机源于分裂后新建国家的激进民族主义政策。由于这类国家往往担心境内少数民族仍然忠于原有的祖国，因而特别地限制他们的政治和自由空间。这一政策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反而激起少数民族的分裂情绪并得到其原祖国的支持，从而引起新一轮的族群冲突(Brubaker 1996)。实例主要是前南斯拉夫分裂后新建的几个国家(Cederman et al. 2009)。

跨界族群导致分裂主义运动的“机会”方面，欧美研究认为关键在于该族群拥有的资源与组织能力这两点(Cederman et al. 2010)。如果跨界少数民族群在亲属国为多数民族，并掌握国家机器，其分裂运动便可能获得最需要的资源，如资金、武器、军事培训、军事基地、外交援助（比如为跨界民族争取国际上对其自决权的承认）。分裂运动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得到这些资源(Gleditsch 2007)。其他重要的资源包括一定的人口规模，聚居地离东道国的政治中心有较远的距离，以及崎岖的地理条件(Cederman et al. 2009)。

以上有关“动机”和“机会”的论点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解体以后，一些新建国里又出现了的进一步分裂运动。比如没有塞尔维亚的支持，波黑境内的塞族可能不会发起分裂运动。然而这些主要着眼于跨界族群的论点不免以偏概全，不能解释当今世界上其他许多相反的现象。

比如在后苏联的新建国里，滞留在当地的俄罗斯人并没有进行分裂主义运动。为什么？按理说他们的人口在当地占相当比例，背后又有强大的亲属国（俄国），发动分裂的“动机”和“机会”都应该充足。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发起分裂战争，反而大多数还相当地平静(Cederman et al. 2013)。



为什么世界上争取独立的少数族群，大多数恰恰没有自己的祖籍国？他们或生存于相邻的两个或更多国家的边境之间，而这些都是不是他们的祖籍国；如分散于两伊、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人，北非多国之间的图阿雷格人。他们或者聚居于某国境内的一个区域，但邻近没有亲属国，如印度南部和东北部诸多的地方性独立运动。

许多分裂运动由于各种外援而得以坚持，但那些外援并非来自亲属国或跨界同胞，况且它们往往也没有亲属国。如菲律宾摩洛人的独立运动得到利比亚、马来西亚及“国际圣战”战士的援助；印度北部曼尼普利邦的独立运动得到了非亲属邻邦阿萨姆邦和那加兰邦的支持；未被国际承认的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已得到 80 多个国家的支持，并早在 1984 年就加入非洲统一组织；马里境内图阿雷格人的分裂运动得到西非和北非基地组织的指挥 (Nagle 2013)；而西藏流亡政府则长期得到印度和西方国家在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此外，同族的跨界民族之间也有分裂运动或族际冲突，如大陆与台湾、南韩与北韩。由于它们之间的分歧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其纠纷更加不可调和 (Woodwell 2007)。如果一般族群纠纷可以通过各方权益的合理配置而协调，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则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跨界亲属国是否有缓和分裂主义和内战的作用？

一些学者因此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即亲属国在许多情况下不但不会加剧跨界同胞的分裂运动，反而会起到抑制的作用。他们强调的原因主要如下。

首先，“领土收复主义”作为一个理念和政策已经过时，公开坚持这一事业的国家已经不多。极少数不放弃统一大业的国家现在也强调和平手段，而不是武力（包括中国对台湾的立场）。至于过时的原因，有的学者认为“领土收复主义”不但在军事上极少成功，在过程中给国内造成毁坏，还在国际上失去道义。有的学者认为民主制度里尊重民意的理念也起到遏制民主国家之间开战的作用，而走上领土收复道路的国家往往是专制政府 (Nagle 2013)。但“民主和平”这一理论似乎更适用于成熟的民主国家，因为冷战后许多种族战争都发生在新兴民主国家里。

亲属国还有其他抑制侨胞分裂活动的动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已成为世界上广泛接受的国际法则，因此极少有国家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邻国挑动分裂性的反政府活动 (Ambrosio 2001)。在实际利益考虑上，亲属国一方面会担心邻国及其盟友的军事报复，另一方面也会害怕跨界同胞的暴力活动会波及本国领土 (Horowitz 1985)。

无论政治制度如何，亲属国遏制而不是鼓励跨界同胞以暴力争取统一的实例的确很多。爱尔兰坚决反对北爱尔兰分裂势力 (IRA) 以暴力争取统一，以防止其对爱尔兰本身的安全造成危害。当英国威胁要抛弃北爱尔兰时，爱尔兰政府还请美国出面劝说英国留下来 (Bew 2007: 516-18)。2001 年阿尔巴尼亚政府也曾请求北大公约组织帮助阿国巡逻与马其顿的边境，目的是防止跨界同胞在边界组织对马国的袭击 (Phillips 2004)。塔吉克斯坦政府拒绝支持跨界侨胞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分裂运动，从而限制了侨胞与乌国政府武装对峙的能力 (MARP)。马来西亚不支持泰国境内马来族人希望与马国统一的呼吁。中国对缅甸境内几个跨界同胞（果敢汉族、景颇族、掸族）的独立运动也未予理睬。

亲属国与跨界同胞之间松散的关系与认同感，是亲属国抑制侨胞进行分裂活动的又一原因。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成长背景不同，次文化不同，政见分歧，经济利益冲突，经历上的隔膜等等 (Caspersen 2008; Nagle 2013)。中国对缅甸境内同胞的态度是一个冷漠亲属国的典型例子，港台一些居民对中国的模棱认同是冷漠侨胞的实例。韩国国民对其境内来自中国的同胞，也因就业竞争、福利政策、社会地位、文化差异等实际问题而打折扣 (Freeman and Thompson 2011)。因苏联解而被分离到俄罗斯以外各国的俄罗斯裔，并未发动回归祖国的分离运动。相反，他们中



的大多数没有强烈的俄罗斯认同感，出于实际考虑而继续留在东道国。离开当地回到俄国的侨民，也多是出自经济状况的考虑（King and Melvin: 123）。

最重要的是，亲属国（尤其是有一定实力的）可以利用各种资源为跨界同胞提供保护，从而缓和其分裂意向。在主权国家的功能方面，亲属国可通过外交渠道敦促东道国尊重跨界同胞的权益，通过国际组织让跨界同胞的遭遇受到国际关注，通过充当调停者使跨界同胞有机会参与东道国政府的决策过程，通过贸易关系增加三方之间的来往合作，甚至可以通过提供双重国籍为侨胞提供保护。在财力支持方面，亲属国可为跨界同胞提供资金建立文化教育机构，创造就业机会（Nagle 2013）。

最后，一个强大的亲属国和有一定规模人口的跨界少数民族对东道国本身也有威慑作用，从而促使其善待该民族，使它们的关系免于恶化到内战的一步。鉴于这一点，有的学者修正了他们以前认为人口规模很大的跨界民族更容易走上分裂道路的观点。经过新的研究，他们认为当跨界民族的人口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便对东道国有抑制作用。东道国会注重他们的权益，从而缓和分裂主义（Cederman et al. 2013）。

跨界族群的治外法权问题

东欧及后苏联地区诸多国家的解体和重组，也把复杂混乱的侨民问题推到各国政府的议程上。对已经分裂的国家，如何保护流散于各个新建国家的侨胞？对那些没有分裂的国家，边界的重组也使他们中有的拥有了新的邻国和跨界同胞，有的则对曾经失去的故土和同胞抱起了回归的幻想。在此背景下，多国的共同对策是授予境外侨胞双重国籍或部分公民权。然而这一做法又牵涉治外法权，有曲线“复国主义”的嫌疑，带来新的冲突。跨界民族的双重国籍在中国也是个敏感问题，尤其在延边和新疆/哈萨克斯坦边界。

1989 后，为境外和跨界同胞授予公民权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有俄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授予部分公民权（各种福利和优惠政策）的有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俄罗斯、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塞尔维亚。提供法律保护 and 侨民援助的有克罗地亚、匈牙利、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Pogonyi et al. 2010）。

现实里，各国上述政策的动机和效果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令人担忧。比如叶利钦于 1992 年颁发的“俄罗斯联邦境外俄罗斯公民的权益保护法”，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而非民族认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感一度迷惘，右翼的民族主义党派与左翼的新共产党又乘机攻击叶利钦政府抛弃了俄罗斯境外的同胞。1991 年后俄罗斯政界和舆论界逐渐有了共识，即新的民族认同将建立在这一概念上：俄罗斯是境内外俄罗斯人共同的祖国，是一个对境外俄罗斯文化群体有责任的国家。1992 年末叶利钦政府同意给任何在俄罗斯境内出生及任何未获取其他国家公民身份的个人授予公民身份，中央政府并开设了专门机构，办理入籍迁移手续（Melvin 1996: 10; King and Melvin 2013:120）。然而，如果境外侨民问题没有成为反对派攻击叶利钦的政治工具，也许俄罗斯不会有这些政策。

同样，从后苏联各国回归到俄罗斯的侨民，也并非出于文化和民族的“认同感”。回归潮集中在苏联解体初期的前五年，到 1996 各国内政稳定以后年开始不断下降。总共人数 200 多万，占有后苏联国家里俄罗斯侨民的 10% 左右。他们离开的大多是相对贫困的中亚国家。如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分别流失一半或近一半的俄裔，哈萨克斯坦也失去三分之一的俄裔。其中哈国对俄裔的权益保护甚好，因为哈国独立时俄裔在该国的人口总数稍胜于哈族。但相当规模的俄裔仍选择离开这里，说明了经济因素的重要（King and Melvin 2013: 123; OKA 2007）。大



批俄裔回归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东道国境内的武装冲突，比如近半的俄裔离开了格鲁吉亚。但大批非俄裔的其他族群也同样选择离开境内有内战的国家，也说明了认同感不是重要因素。

中国的邻国哈萨克斯坦，当年被迫独立时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唯一的一个命名少数民族未占多数的民族自治区（1989年哈萨克人占39.7%）。为了提高哈萨克族的人口比例，哈国政府于1992年实行了一系列吸引侨胞归国的优惠移民政策，包括提供住房和失业津贴。前5年间有15余万侨胞回归，其中大部分来自前苏联重组后的各国（55%）和蒙古（40%），也有几百人从中国回归。哈国政府鼓励归侨在哈萨克族人较少的地区安家，但在这些地区却不能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就业机会和住房，致使不少归侨失望。90年代哈国制定的侨胞回归配额一般只用完三分之二，而且到1995年已有5%的归侨离开哈国（King and Melvin, 129）。

哈国政府在大力引侨归国的同时，又不得不担心输送国也关注他们在哈国境内同胞的权益，尤其是俄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为避免这一点，哈国在宣传上着意把来自土耳其和蒙古的侨胞描写成典型的回归侨胞。但事实上从土耳其回归的同胞数量甚少，还常埋怨哈国的生活条件不如土耳其。来自蒙古的侨胞则怀念他们的草原生活（King and Melvin 129-130; OKA 2007）。哈国境内有新疆以外最大的维吾尔族聚居地，约15万余人，占该国人口的1.4%。哈国独立后他们不再享受苏联时代的优惠民族政策。为了防止他们争权益，也更为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哈国政府积极与中国政府配合抑制泛维吾尔分裂主义。出于在异国他乡生存空间的考虑，哈国的维吾尔族领导人采取了讨好哈国政府，维护哈国主权的立场（OKA 2007）。

其他东欧和后苏联国家的例子也说明民族认同感并非是个很强的粘合剂，也不是个在实际中容易操作的东西。许多国家的跨界民族政策被迫让步于外交，因为治外法权引起与邻国的纠纷。一些国家为跨界同胞提供公民身份的同时，也担心这一政策会激起本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认同其祖籍国，因而他们在实际操作中有收敛。一些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其公民一旦有了跨界国籍便失去在本地的身分和福利，反而恶化了生存环境。一些国家为境外同胞提供福利和权利，但又规定必须在祖籍国境内申请和享用，因而那些权益形同虚设。许多祖籍国的国民在理念上同情境外同胞，但面对大批移民涌入境内抢用福利时，则改变了态度（King and Melvin; Waterbury 2009; Pogonyi et al. 2010; OKA 2007; Casergo 2005）。

跨界同胞的越境投票权还带来了另类的“治外法权”问题。不常居住在祖籍国却持有双重国籍的境外同胞，却有权利影响另一国家的选举结果和国内外政策。这对境内选民来说很不公平。毕竟他们常驻境内，选举结果和新政府的政策与他们才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侨胞的越境选举权却削弱了他们选举权的份量（Pogonyi et al, 2010: 13-16）。

最后还有两个颇为棘手的实际问题。一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遇到如何定义“谁是同胞”的困难。由于长期的杂居、各族相互通婚、相互同化、使用当地通用语，这些事实使族际界限模糊，族群认同感淡漠。二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现其容纳和援助侨胞的能力其实远不如民族主义口号那么来得容易。因此，在通过治外法权以赢得境外同胞的民族认同感这个问题上，最终的现实使亲属国的理想破灭，而东道国的担心则显得多余。

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中国作为众多边境少数民族群的东道国，并无必要对分裂主义过分敏感。如本文综述的西方文献所指出，一个有相当实力及主流民族人口规模的国家，本身对分裂主义就有威慑作用。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坚实的国内资源和丰富的外交资源去抑制分裂主义。在一般情况下，跨界族群的亲属国不可能支持侨胞在中国境内闹分裂。相反，他们更可能为了与中国的关系而抑制跨界同胞的统一梦想。亲属国在中国境内的投资和其他经贸活动并不能促成分裂主义，也不会造成



事实上的分裂状态。正如港台的投资不可能把深圳福建变成其管辖的一部分，南韩的投资也不能把延边演变为其领土的一部分。毕竟当地的多数族群为主流民族，当地的行政管理，法律条令及政府官员都受限于中国的制度框架。

同时，中国应该理解并化解某些跨界族群的亲属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戒心。比如中国应努力让蒙古国放心，中国并无收复其领土的企图。换位思考，中国应该理解自己作为一个曾经的祖国，一个当今庞大的跨界邻国，一个来势汹汹的投资国，为什么会对蒙古国造成不安全感？正如中国对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任何举动，都有一种真切由衷的不安全感。甚至对南韩少数民族主义分子的极端言论，中国也都十分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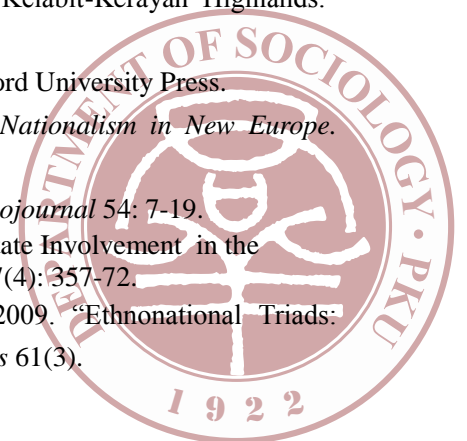
第三，中国没有必要戒备和介意跨界民族的多元认同。由于边境地区的地理及历史原因，跨境族群的认同感往往建立在跨境双边广泛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网这一层面，而并非首先在国家这一层面。即便在族群关系极端政治化的后社会主义各国，我们也从本文的综述里看到跨界族群的认同感不十分宣明。相反，非政治因素对他们个人层面的选择往往更有影响。众多的研究显示，特定的地缘和社会环境都决定了边境区域的跨界族群通常是双语双文化及多元认同（e.g., Bunsink 2001; Flynn 1997; David 2003; Bala 2001; Chew 2004）。因此没有必要把他们界定于固定的定义里，甚至去防备和害怕它。

跨界族群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恰恰在于他们的双语双文化，他们的跨界社会关系网。这是跨界区域的特有优势和社会资本，有利于交流，互信与合作。珠江三角洲和渤海湾区域飞速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两地区特有的跨界族群社会资本（Chen 2001）。大量台资在大陆的发展也说明，即便有政治和领土纠纷也没有必要影响经济上的交流合作与和平共荣。语言文化上的互通，跨界的乡情，都可助以弥补政治上的隔阂。加上跨界双方的地域和经济条件的相互互补，则更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成功例子如香港与深圳，台湾与福建，澳门与珠海。

最后，本文对跨界族群与东道国及亲属国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还揭示了一个中国尤其应该注意的问题。对那些没有祖国而又有一定人口规模和独特文化的少数族群（最突出的是维吾尔和藏这两个族群），如何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自主感？由于没有亲属国，此类族群的精英不免会对本族群的文化遗产、语言保护和发展前景抱有特殊的使命感。如果他们的权益在这方面受到损害或限制，他们的归属感也会受到影响。而保障他们归属感的最佳途径则是增强他们的自主感，比如更大程度地参与有关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决策过程，对本民族区域内的资源有更大的决策和支配权，而不是一味被动地接受国家和外省设置好的援助及发展方式。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远比跨界族群本身更有挑战性。

参考资料

- Ambrosio, Thomas. 2001. *Irredentism: Ethnic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estport, CT: Praeger.
- Bala, Poline. 2001. "Interethnic Ties: The Kelabit and Lun Berrian in the Kelabit-Kerayan Highlands." *Borneo Research Bulletin*, 32: 103-111.
- Bew, Paul. 2007. *Ireland: The Politics of enmity 1789-200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ubaker, Rogers. 1996.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ism in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nsink, Jan. 2001. "The binational reality of border-crossing cities." *Geojournal* 54: 7-19.
- Caspersen, Nina. 2008. "Between Puppets and Independent Actors: Kin-state Involvement in the Conflicts in Bosnia, Croatia and Nagorno Karabakh." *Ethnopolitics* 7(4): 357-72.
- Cederman, Lars-Erik, Luc Girardin and Kristian Skedde Gleditsch. 2009. "Ethnonational Triads: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Kin Groups on Civil Wars." *World Politics* 61(3).



- Cederman et al. 2010. "Why do ethnic groups rebel? New data and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62 (1): 87-119.
- Chen, Xiangming. 2001. "Both glue and lubricant: Transnational ethnic social capital as a source of Asia-Pacific subregionalism." *Policy Sciences* 33: 269-287.
- Chew, Daniel. 2004. "Borders of kinship and ethnicity: cross-bord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Kelalan Valley, Sarawak, and the Bawan Valley, East Kalimantan." *Borneo Research Bulletin*, Jan. 2004.
- Davis, Sara. 2003. "Premodern Flows in Postmodern China: Globalization and the Sipsongpanna Tais." *Modern China* 29(2): 176-203.
- Flynn, Donna K. 1997. "'We are the border': identity, exchange, and the state among the Benin-Nigeria border." *American Ethnologist* 24(2): 311-330.
- Freeman, Carla and Drew Thompson. 2011. *China on the Edge: China's Provinces and China's Security*.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National Interest and Johns Hopkins SAIS.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leditsch, Kristian Skede. 2007.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4(3): 293-309.
- Helgre, Havard et al. 2001. "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and Civil War 1812-199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1): 16-33.
- Holsti, Kalevi. 1997. *The State, War, and the State of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rowitz, Donald.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ing, Charles and Neil Melvn. 1999/2000. "Diaspora Politics: Ethnic Linkages, Foreign Polity and Security in Eur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3): 108-38.
- MARP (Minorities at Risk Project). "Chronology of Tajiks in Uzbekistan."
- Melvin, Neil. 1995. *Russians beyond Russia: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Pinter.
- Mouseau, Michael. 2000. "Market Prosperity,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Democratic Pea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4(4): 472-507.
- Nagle, John. 2013. "Does having a kin state lessen the likelihood of minorities engaging in secessionist mobil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kin state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19: 287-309.
- Natsuko Oka. 2007. *Managing Ethnicity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Transborder Nationalism in Post-Soviet Kazakhstan*. Area Studies Center,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ETRO.
- Partell, Peter and Glenn Palmer. 1999. "Audience Costs and Interstate Crise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Fearon's Model of Dispute Outcom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3: 389-405.
- Phillips, John. 2004. *Macedonia: Warlords and Rebels in the Balkans*. London: I.B. Taurus.
- Pogonyi, Szabolcs et al. 2010 / 6. "The Politics of External Kin-State Citizenship in East Central Europe." UDO Citizenship Observatory, 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 Comparative Report, RSCAS/EUDO-CIT-Comp.
- Saidman, Stephen. 1997.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ecessionist Conflict: Vulnerability versus Ethnic 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4).
- Saidman, Stephen and William Ayres. 2000. "Determining the Causes of Irredentism: Logit Analysis of Minorities at Risk Data from the 1980s and 1990s." *Journal of Politics* 62(4): 1126-44.
- Sambanis, Nicholas. 2001. "Do Ethnic and Non-ethnic Wars Have the Same Caus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5(3).
- Waterbury, Myra. 2009. "From Irredentism to Diaspora Politics: States and Transborder Ethnic Groups in Eastern Europe." Glob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olitics Working Paper No. 6
- Weiner, Myron. 1971. "The Macedonian Syndrome: A Historical Mode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